

艾瑞卡·切诺维斯 文
言晓义 译

作者艾瑞卡·切诺维斯 (Erica Chenoweth) 是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伯索尔德·贝茨人权与国际事务教授，有《为什么公民抵抗管用》(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等重要著作

译者言晓义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获台湾梁实秋文学翻译奖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1期
2024年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非暴力抗争 的未来

编按：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公民非暴力抵抗超越了武装斗争成为革命运动最常使用的动员形式。然而，从世界范围看，近10多年来，公民抵抗的收效有所下降。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可以从中得到哪些教益？这正是艾瑞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此文分析讨论的重点。该文首发于美国《民主季刊》2020年第3期(*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1, Number 3, July 2020, pp. 69-84, <https://muse.jhu.edu/article/760088>)。

2019年见证了堪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非暴力反政府民众运动浪潮。¹声势浩大的抗议、罢工和示威活动在数十个国家爆发，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的。虽然2011年早就被冠以“抗议之年”，但2019年更有资格获得这一称号。

其中有几场运动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果。2019年4月，苏丹暴君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倒台。巴希尔曾在他的统治时期一手制造了数十万生灵涂炭的达尔富尔大屠杀。1990年代，他为圣战组织提供庇护，并大规模逮捕、酷刑和草菅人命，以此恫吓反对者。巴希尔倒台几周后，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也因一场“微笑革命”(Smile Revolution)，被民众起义赶下了台，当时他正在寻求违宪的第5个任期。2019年7月，在波多黎各数十万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并停工后，总督被迫辞职，事件的起因是他的无能和对玛丽亚飓风受害者的嘲弄言论触犯了众怒。自2019年10月以来，在伊拉克、黎巴嫩和玻利维亚等不同的国家，政府均被大规模民众抗议运动推翻。在智利，反对紧缩措施的抗议迫使政府就其财政政策展开了长时间的谈判。在香港，亲北京的引渡条例催生了民众自发的街头运动，随之而来的管治不善和残酷的镇压如雪上加霜，导致抗争人数有增无减，民众诉求也进一步升级，促成了泛民主党派在2019年11月区议会选举中获胜。在印度，总理纳伦德

拉·莫迪（Narendra Modi）政策向右转的合法性首次遭遇严重挑战，数十万印度人开始投身一场大规模运动，反对一项将导致数百万印度穆斯林失去国籍的公民登记计划。而自2017年以来，美国自身也经历了民众运动浪潮，诉求目标包括推动种族正义、移民正义、枪支管控、女性权益、气候正义、LGBTQ权益，以及寻求弹劾川普或促其辞职等。

然而，短短几个月后，这种街头活动就大都嘎然而止了。2020年初，全球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以及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迫使人们放弃了聚众示威。这种传统大众抗争形式的骤然停顿，被世界各地许多政府趁机利用，借机推进各种引发纷争的政策，从搁置言论自由到有争议的司法任命，再到禁止移民或难民入境等。

近年来，民众运动本已面临一系列艰难挑战，疫情大流行引起的中断只不过是雪上加霜。事实上，尽管非暴力抗争运动的流行在过去10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其有效性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滑坡，主要是因为这些非暴力运动本身的结构和能量发生了变化。或许出乎意料的是，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有助于解决其中一些根本问题，因为它促使非暴力运动将重心重新转回到关系建设、草根组织、战略，以及开发能够让受众产生共鸣的叙事上。随着2020年的推移，许多运动，包括在美国出现的运动，已经以更强的实力和更强的争取长期变化的能力，而卷土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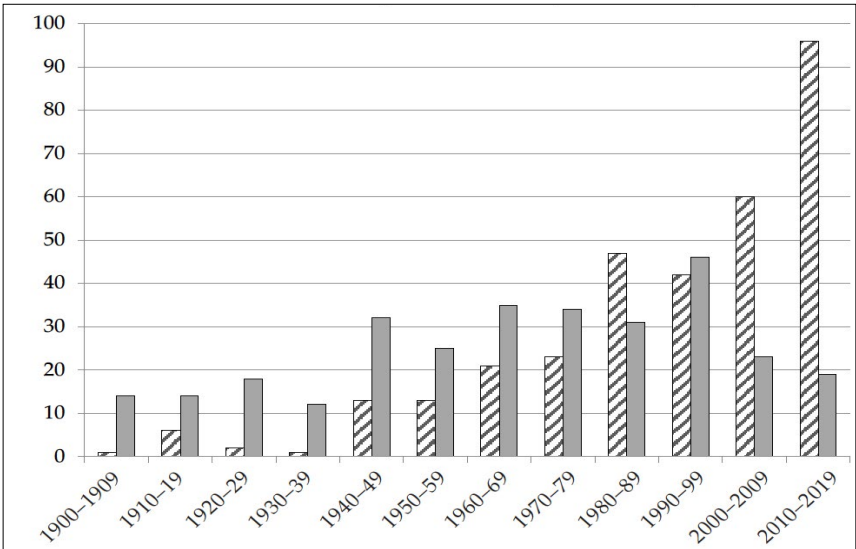
非暴力抗争的扩大

非暴力抗争是一种斗争方式。它是指手无寸铁的人们通过集体行动——包括抗议、示威、罢工和不合作——建立抵抗对手的力量，从而实现政治目标。

非暴力抗争有时也被称为“公民抵抗”、“人民力量”、“非武装斗争”或“非暴力行动”，它已经成为全球各地政治行动的支柱。武装斗争曾经是从政治体制外争取变革的主要运动方式。如今，压倒性地依赖于非暴力抗争的运动取代了武装斗争，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抗议行动方式。

例如，分析家们发现，1900年-2019年期间共有628场目标最大化的民众运动（即试图推翻现任国家领导人，或试图通过分离或驱逐外国军事占领或殖民势力来实现领土独立的运动）。²尽管解放运动通常被描绘为武装叛乱，但³这些运动只有不到一半（303宗）涉及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其他325宗运动则是主要依赖非暴力的民间抗争。³鉴于严峻的环境，越来越多的人转向非暴力的公民抵抗而不是暴力，在过去50年里，这一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

图1非暴力和暴力大规模运动的肇始时间，按10年期划分（1900年至2019年）



非暴力（斜线标识：325宗），暴力（灰色标识：303宗）

正如图1所示，暴力叛乱自1970年以来减少了，而非暴力抗争运动变得愈加普遍。而从2010年到2019年，这最近十年的数字着实令人震惊。这一时期不仅涌现了自1900年以来数量最多的非暴力抗争，而且爆发了不少于96宗目标最大化的非暴力运动。这远远超过了前此十年内爆发的革命事件的数量（2000年至2009年间有60次）。仅在2019年一年内，就出现了15宗新兴的大规模非暴力运动，此外，还有24宗延续中的运动，在2019年结束时仍在进行。

为什么寻求政治变革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公民抵抗呢？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可能是因为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非暴力抗争是一种正当且成功的变革途径。下文将详细讨论这一因素。尽管非暴力抗争尚未被普遍理解或接受，但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偏好已越来越普遍。⁴

其次，新的信息技术使得了解以前不会见诸报端的事件变得更加容易。⁵随着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报纸网站、社交媒体、私人聊天室等在线途径获取新闻。身在蒙古的人们可以读到发生在非洲马拉维的人与事，从中得到启发并有所受益。作为一种越来越普遍且有效的斗争方式，公民抵抗正得到全球新闻媒体和学者的日益关注。而且，通过新的沟通渠道，人们还可以绕过网络门户的守门人，直接与他们认为志同道合的人交流。由于精英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轻而易举地控制信息，因此现在更容易看到描写普通人的新闻和信息。

第三，暴力市场正在枯竭。这一点在外国对武装组织的支持方面最能见微知著，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类支持急剧减少。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曾

资助过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数十个反叛组织。1991年后，全球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实际上结束了这种代理人竞争。

第四，在战后时代，社会开始更广泛地重视与期待公平、人权保护和避免不必要的暴力。⁶这种规范性的转变可能提升了大众对公民抵抗作为人权倡导方式的兴趣。⁷与过去相比，战争的恐怖更为显而易见，而现实的替代方案也明显更为触手可及。正如塞琳娜·加洛-克鲁斯（Selina Gallo-Cruz）所指出的那样，冷战后非暴力抗争的兴起也与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的日益壮大有关，这些组织明确致力于分享非暴力抗争理论和实践的信息，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非暴力国际（Nonviolence International）和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Non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⁸

第五，从更令人忧心的方面说，如今人们可能有了新的抗争的动机。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主政府出现了动摇，并演变成威权主义。⁹近年来，无论是在埃及、匈牙利和土耳其等威权国家，还是在巴西、波兰和美国等民主国家，民主权利的削弱都引发了大规模抗议运动。随着川普上台就任美国总统，该国许多人开始接受公民抵抗的理论和知识，并将之付诸实践。随着美国退出全球民主议程，甚至国内民主机构受到侵蚀，人们的信心开始动摇，彷徨于既有建制是否愿意，或能否，应对诸如种族公正、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迫切的政策挑战。在世界许多地方，青年人口正在增加，这些人口压力产生了对就业、教育等机会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在某些地方，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失业人数创下新高。早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前，人们对经济正义和机会的普遍预期，就已经与2008年金融危机

后的疲弱所带来的令人失望的现实发生了冲突。

因此，公民抵抗运动在世界各地的大规模发展既是成功的标志，也是失败的象征。成功之处在于，如此之多的人相信可以利用战略性的非暴力手段来对抗不公正，从而转而采取武装行动的人则越来越少。失败之处在于，如此之多的不公正依然存在，而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机构却少之又少，因此对于公民抵抗的需求增加了。

非暴力抗争的记录

如果不了解公民抵抗的机理，就很难理解我们今天所置身的政治世界。1989伊始，国际体系似乎完全是围绕着强大的民族国家和统治它们的精英组织起来的。那一年，中欧、东欧的公民起义推翻了受苏联支持的政权，这标志着30年剧变的开始。在南非，黑人领导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成功地推翻了该国法定的种族歧视制度，尽管种族主义、隔离和经济不平等仍然存在。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欧和中亚，一些独裁政权已屈服于所谓的“颜色革命”。基本和平的抵抗运动推翻了三位阿拉伯世界的独裁者，并动摇了其他几位独裁者的统治。

所有这些变化，都整体上或部分地源于持续的基层公民行动。事实上，第三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的运动推动的，这些运动要求政府扩大个人政治权利，并通过公平选举、新闻自由、公正的刑事司法系统等方式来实现问责。¹⁰

研究公民抵抗的学者通常将“成功”定义为在运动达到顶峰的一年内，能

够推翻政府或实现领土独立。¹¹在过去120年间开始和结束的565场运动中，约有51%的非暴力运动取得了彻底成功，而暴力运动则只有约26%取得了成功。因此，非暴力抗争的成功率是暴力的两倍。（另有16%的非暴力运动和12%的暴力运动以有限的成功告终，而33%的非暴力运动和61%的暴力运动最终失败。）此外，在发生过公民抵抗运动的国家中，冲突之后，民主巩固的机会、相对稳定期以及各种生活质量的指标都高于经历了内战的国家。¹²

这一点即使在非暴力运动面对的是残暴的独裁者时也成立。与流行的认知相反的是，非暴力运动的兴起或成功，并非主要是因为它们所对抗的政权在政治上软弱无能，或不肯使用大规模暴力。一旦民众运动兴起、动摇了现状，大多数政权都会用蛮力对付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其结果是发现

与流行的认知相反的是，非暴力运动的兴起或成功，并非主要是因为它们所对抗的政权在政治上软弱无能，或不肯使用大规模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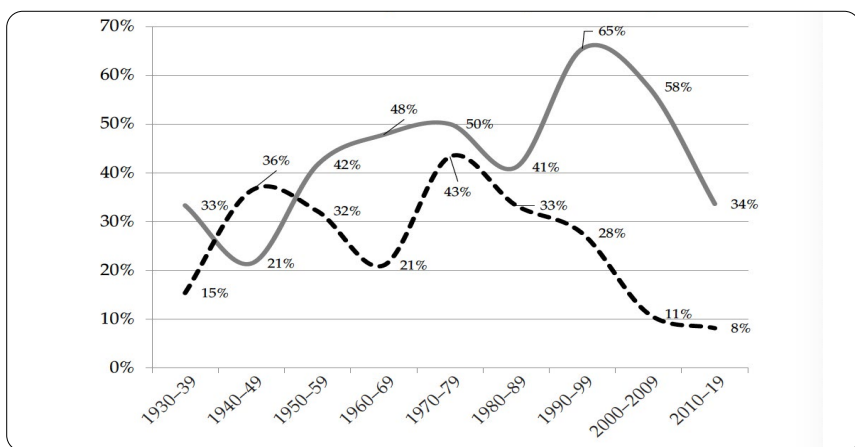
更多的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暴行。¹³此外，即使考虑到政权类型、政府镇压和军事能力等因素

，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仍然远远高于暴力抵抗。¹⁴这是因为与武装运动相比，非暴力运动的规模往往更大，涉及的领域更广，因而在政治上更具代表性。这就为非暴力运动提供了许多机会，通过那些机会，它们可以在决定性时刻引发叛变，撬动政权的支柱，使其摇摇欲坠。当安全部队拒不执行对示威者开枪的命令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比如在2000年的塞尔维亚。或者，当商界或经济精英开始响应公众压力，表达对运动的支持时，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就像南非的白人企业主那样，他们在黑人领导的几波罢工、抵制和全球制裁浪潮后选择支持反种族隔离的运动。在其他情况下，一些重要的政治参与者，如强大的工会或专业协会，开始停止与政权

合作，就像2019年苏丹革命中发生的那样。基本上，运动规模越大，打破现状、引发撼动政权主要支柱的叛乱的机会就越大。而且，非暴力运动有能力以武装组织无法企及的方式扩大参与。¹⁵那种认为只有暴力行动才强有力且奏效的普遍观点，是大错特错的。

当然，公民抵抗运动并不总能带来和平与繁荣。2011年在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对非暴力斗争的回应是对平民使用军事力量，甚至使用了化学武器。由此引发的冲突至今已经持续了近10年，成为本世纪最血腥的内战之一，迫使约三百万人逃离这个国家。2011年，美国支持的巴林政府镇压了一场试图挑战君主制的非暴力运动。而2014年2月在乌克兰，人民力量运动成功地推翻了俄罗斯支持下的寡头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的统治，但俄罗斯非但没有允许乌克兰更深入地融入到欧洲轨道，反而占领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并助长了乌克兰东部持续不断的、致命的分裂战争。

图2非暴力和暴力民众运动成功率（按10年期划分：1930-2019）



非暴力 (数量: 320), 暴力 (数量: 261)

过去10年里，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低于其历史对应的水平。从1960年代到2010年左右，革命性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一直保持在40%以上，1990年代甚至达到了65%。然而，正如图2所示，所有革命的成功率自那时以来一直在下降。自2010年以来，仅有不到34%的非暴力革命和8%的暴力革命取得了成功。

尽管政府在镇压对其权威的挑战方面更上一层楼，但非暴力抗争仍然以4比1的比例超过暴力抗争。这是因为武装对抗的成功率变得越来越低，一直在延续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下降趋势。尽管如此，但过去的10年也见证了公民抵抗成功率的急剧下降，扭转了以往60年总体上升的趋势。因此，过去的10年呈现出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正值公民抵抗成为挑战政权最常见的途径时，它却开始变得不那么奏效了——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

发生了什么变化？

说到公民抵抗运动收效的下降，最有诱惑力的解释集中在它们当前所处环境的变化上。

首先，运动可能正在面对更为稳固的政权——这些政权通过巩固当地盟友和关键居民的支持、监禁杰出的反对者、刺激对手使用暴力、煽动对境外势力或帝国主义阴谋的恐惧，或者通过获取强大的国际支持者的外交掩护，而粉碎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事实证明，在面对来自底层的挑战时，白俄罗斯、伊朗、俄罗斯、叙利亚、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的政权表现得特别有韧性。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事活动的人士面临着严峻的困难。然而，对运动的失败进行的这种事后解释也有不足为训之处。许多政权，比如苏丹的巴希

尔政府，在被非暴力抗争运动推翻之前一直被视为坚不可摧，然而在事后，观察者们却声称这些政权终究是薄弱的。但历史上，许多曾经稳定的专制政权，比如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埃里希·霍内克统治下的东德、侯赛因·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和共产主义波兰，都在标志着非暴力运动达到巅峰的诸种高超动员之后，最终屈服于非暴力运动。

其次，政府可能正在学习和适应来自底层的非暴力挑战。¹⁶几十年前，威权政权经常会被突如其来大规模非暴力起义所吓倒，苦于寻找能够镇压这些运动、同时又不会引发民众对被镇压者更加同情和支持的方法。精英阶层也可能低估了人民力量对其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的潜力。今天，鉴于非暴力运动的成功已有大量历史记录，国家行为者更有可能将这些运动视为真正的威胁。因此，威权政权已经发展出一套政治上老道的镇压方式。¹⁷其中一个突出的战略就是渗透到运动中，从内部制造分化。通过这种方式，当局可以趁非暴力运动尚未建立足够广泛的基础获得大众支持和持久力之前，挑动运动采取包括暴力在内的、更激烈极端的战术。

第三，随着唐纳德·川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美国加速从其作为超级大国的全球角色中撤退，同时也放缓了支持民主计划的步伐。尽管许多人批评这种计划是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新帝国主义形式，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建立自由国际秩序的同时，也发生了人权体系的扩张，那些体系产生了政府的和非政府的监督机构，能够指出和谴责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趋势可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为政治异见开辟了空间。¹⁸丹尼尔·里特尔（Daniel Ritter）提出，在后冷战时代，威权政权特别容易受到来自底层的非暴力挑战，因为它们需要维持对人权的表面尊重，以安抚他们的民主国家盟友和援助者。¹⁹例如，埃及对外国援助的依赖意味着，当2011年爆发革命时，埃及军方对来自美国

等自由民主国家的观察审查高度敏感。如果没有一个积极主动的美国，更广义地说，如果没有一个真正能对威权政权施加影响或进行执法的强有力的人权倡导者，对非暴力异见者的残暴打压只会更加猖獗。

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它也夸大了美国在全世界真正捍卫民主和人权的程度。毕竟，美国在战后帮助扶植右翼独裁者的历史由来已久——当中包括伊朗的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国王、刚果的约瑟夫·蒙博托将军、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以及其他通过美国支持的政变上台的人。这种说法还高估了提供支援的民主国家对它们的威权盟友在处理国内事务上的实质影响力。从历史上看，非暴力抗争运动的命运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确保民众参与，以及在安全部队和经济精英中争取倒戈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多变的外国政府的行为。²⁰

因此，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尽管各国可能在预测和镇压非暴力抗争上更上了一层楼，但这两个结构性的论点在历史记录中几乎找不到多少依据。相反，对非暴力运动收效下降的最具说服力的解释，是运动自身性质的变化。

运动的变化

首先，在参与度方面，公民抵抗运动的规模平均来说，相较于过去有所缩小。的确，2010年后的几年里曾发生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大规模示威活动。2017年和2019年，委内瑞拉有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参加抗议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示威。据报道，2019年10月在智利，反对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政府的抗议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了一百万人参加。然而，尽管出现过公共场合万头攒动的戏剧性画面，但总体上说，近年来运动在高峰时期的声势，

实际上比不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功的运动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非暴力运动平均能够动员所在国家约2%的人口。20世纪90年代，这个平均数字更高达2.7%。但自2010年以来，非暴力运动的平均峰值参与度仅为1.3%，延续了2000年代开始的下降趋势。这是一个关键的变化。一场大规模抗议吸引的人口比例越大、人口横截面越多元化，它才越有可能成功。

其次，当代运动倾向于过度依赖大规模游行，而忽视了其他可以更有力地瓦解政权稳定的手段，如大罢工和大规模的公民抗命。由于大多数人将抗议示威与公民抵抗联系在一起，所以那些寻求变革的人在形成真正的持久力或转型战略之前，越来越倾向于发起这类行动。与其他方式相比，街头抗议可能更容易在短时间内组织或即兴而为。在数字时代，即使没有任何结构化的组织联盟来提前进行规划和协调沟通，这类行动也能吸引大量参与者。²¹但大规模游行并非总是向精英施压的最有效方式，尤其是在游行无法长期持续的情况下。其他不合作手段，如大罢工和闭门不出，可以对经济生活造成更大的干扰，因此能够引起当局更迅速的让步。往往是悄无声息的幕后策划和组织，才能使运动可以长期有力动员，以及以有助于建立参与、影响力和力量的方式，来协调、安排战术行动的顺序。²²对于许多缺乏领导的当代运动来说，这样的能力可能难以发展出来。

第三个重要因素可能与运动过分强调公众示威和游行有关：近年来的运动越来越依赖于数字化组织，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²³这种组织形式既有长处也有短处。一方面，数字化组织使当今的运动能够在短时间内大规模集结参与者。²⁴它使人们得以在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受众中广泛传播他们的不满。它为组织者提供了与大众沟通的、不受主流机构或政府控制的传播渠道。然而，由此产生的运动相对缺乏条件将其人数纳入到有效的组织中，

即能够制定计划、协商、确立共同目标、在胜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维持其瓦解政权的能力的组织中。²⁵一些从数字化组织中产生的运动已经找到了创建长期组织的方法。但即便如此，它们最初对互联网的依赖也仍有其不利的一面：更便捷的沟通也意味着更容易被监视。当权者可以利用数字技术监视、筛选和打压异见者。独裁者不仅利用数字技术拉拢自己的支持者，还传播错误信息、宣传和反向信息。

这就带出了可能导致当代公民抵抗运动收效降低的第四个因素：非暴力运动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或容忍诉诸暴力的边缘群体。²⁶从1970年代到2010年，带有暴力倾向的非暴力运动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0%到35%之间。而在2010年至2019年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二分之一以上。

即使在绝大多数活动人士都坚持非暴力时，如果公民抵抗运动中夹杂着一些武装暴力，比如与警察街头斗殴或攻击那些反对抗议者的人，那么最终的成功率往往会低于坚守纪律、拒绝暴力的运动。²⁷这是因为暴力往往会加剧对运动参与者和同情者无差别镇压，同时使运动更难将参与者描绘成这种暴行的无辜受害者。稳固的政权会将小规模暴力冲突者描绘为对公共秩序的威胁。事实上，政府往往会对运动进行渗透，挑动他们在边缘地带采取暴力行动，从而给政权使用强硬手段提供正当理由。当权者真正害怕的是有韧性的、非暴力的、大规模的反抗，因为这会暴露他们不可战胜的光环其实是谎言，同时也消除了他们采取暴力镇压的任何借口。

将当代运动与其历史先例进行比较，可以得出几个清晰的教益。首先，与那些在制定政治纲领和战略之前就走上街头的运动相比，在大规模动员之前就进行精心策划、组织、培训和建立联盟的运动，更有可能吸引大量不

同的追随者。其次，规模和多样性不断扩大的运动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尤其是在能够保持势头的情况下。第三，不完全依赖数字化组织技术的运动更有可能建立可持续的追随者。最后，那些为在压力下保持团结和纪律制定了战略的运动，比那些在这些问题上听之任之的运动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非暴力抗争有前途吗？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对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数十场公民抵抗运动构成了一次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确实，在疫情流行开来的最初几个月，主流报纸上的头条新闻经常是在宣布抗议活动的终止。由于社交隔离法规的实施以及多个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大，抗议活动的结束成为常态。²⁸但正如美国因白人治安员杀害阿赫马德-阿贝里（Ahmaud Arbery）以及警察杀害布罗娜-泰勒（Breonna Taylor）和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而引发的大规模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所表明的那样，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地方，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时代都不会终结。

不过，即使推动运动的原因仍然存在，全球各地的封城也为下一阶段民主和权利的长期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回顾、重组和规划的机会。事实上，鉴于近期运动的成功率有所下降，如果民众运动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种重组和评估可能是必不可少的。未来运动自下而上建立人民力量的能力，取决于它们在全球停摆期间如何投入时间和资源。

我们有理由对此抱有希望。首先，支持民主和进步的活动分子们现在普遍采用的许多措施——诸如互助小组、罢工、闭门不出、病假、在线教学，

以及声援和集体支持一线工人的各种表达方式——都是运动格局中的积极转变。仅在美国，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湾区等城市，那里的互助网络就已经众筹了紧急救援资金、食品、个人防护设备及各种不时之需；协调了资金和重要物资的分配；提高了社区对疫情（和政府应对措施）给黑人和棕色社区带来的不平等影响的认识。在疫情期间，这些网络加强了沟通、基层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及社区的信任和互利行为。随着反种族主义抗议的爆发，这些努力得到了提振。在政府对大规模抗议做出强硬回应后，许多互助网络立即动员向保释基金捐款，并提供其他形式的社区救济。

尽管这些措施很少能像大规模示威那样吸引眼球，但它们代表了战术创新的新阶段。通过这些努力，运动正在更新和刷新过时的游戏指南，因为旧的指南曾导致他们完全依赖于抗议，而忽略了诸如不合作和开发替代方案等方法。过去，从印度的独立运动到波兰的团结工会，再到南非和美国的黑人解放组织，当这些运动发展出替代性机构，并以此建立自给自足的能力、解决被政府忽视或忽略的社区问题时，它们就获得了公民的力量。甘地称之为“建设性方案”，并认为这是他称之为“真理之力”（Satyagraha）的非暴力抗争技术的两大支柱之一，与不合作同等重要。

过去，从印度的独立运动到波兰的团结工会，再到南非和美国的黑人解放组织，当这些运动发展出替代性机构，并以此建立自给自足的能力、解决被政府忽视或忽略的社区问题时，它们就获得了公民的力量。

当然，许多抗议活动仍在继续——要么公然与社交隔离措施对着干，要么是无视这些措施的存在。

这就更使得这些行动变得引人注目和令人信服。人们愿意冒着健康风险来抵抗不义之事，这一事实提高了人们对其诉求的严峻性和紧迫性的

认识。在另一些地方，人们正在尝试在社交距离下进行抗议，包括汽车车队、敲锅敲碗的抗议（cacerolazos），甚至就是社交隔离抗议，比如2020年4月在特拉维夫发生的、反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1,200人抗议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从仓库员工到食品杂货店老板，再到急诊室的护士，重要岗位的工人利用歇业、请病假和罢工来争取更安全的工作条件，而且往往能够迫使雇主立即做出妥协，提供口罩、手套和危险工作津贴。在医疗、食品杂货、科技和肉类加工等行业，罢工和停工歇业以及其他形式的非合作使这些工人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因为他们对维持食品供应、交通运输和公共卫生服务至关重要。对于政府来说，这一类岗位人员的罢工和停工是很棘手的，对其进行打压很难不引起公愤反弹，这就形成了政府的一个不堪一击的要害。

其次，新冠疫情可能为许多活动人士和组织者提供了一个急需的休整期，他们以往一直是一个游行接一个游行，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反思、制定战略或建立关系。在封城期间，运动得以从策划大型活动的工作中抽身出来，集中精力建立有韧性的联盟，以更大的能力实现持久的转变。世界各地的许多运动都利用这段时间制定长期战略、在潜在的联盟伙伴之间建立关系，并开发旨在发起更有效挑战的培训模块。诸如“地球日直播”（Earth Day Live）这样的活动——一个为期多日的气候正义在线行动——将数百个组织聚集在一起，分享技能、战略和灵感，共同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再比如像“未来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濒危叛乱”（Extinction Rebellion）和“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这样的组织的网络研讨会，讨论在封城期间如何继续推动气候行动。在美国，争取种族正义、选民权利和气候行动的运动召开了技能分享和教育活动，帮助人们了解疫情对边缘社区（包括非裔美国人）造成的不平等影响。这些活

动有助于唤起公众对紧迫的不平等现象的认识，为更大规模和更持久的集体行动创造条件。

最后，疫情的流行让公众看到在应对危机时，民粹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鲜明对比。截至2020年6月撰写本文时，据报冠状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的四个国家——美国、俄罗斯、巴西和英国——均是由民粹主义或威权主义领导人掌舵，他们对这一流行病的处理是灾难性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没有为公众做好长期隔离的准备，没有广泛提供检测和及时准确的信息来控制疫情，而是否认或尽量淡化疫情，引用阴谋论来推卸责任，并煽动国内政治分歧——例如号召支持者对抗主张从严实施公共卫生的市长和州长，或将国家危机归咎于为种族正义而战的抗议者。

这些失误及其致命后果可能具有长期的隐患，但它们也会使公众更加意识到政治变革的紧迫性，提醒选民：危机处理不当会影响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面对政府在应对疫情上的无能，面对公民权利受到的威胁、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以及经济不安全，许多运动已经调整了自己的框架，将焦点放在呼唤真正的民主更新上。在巴西，由于蔑视全球公共卫生建议，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的公众支持率急剧下降，他正面临着第一次真正的政治危机。在尼加拉瓜，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领导层的失败同样为支持民主的活动家提供了推动变革的新动力。

2020年2月份，香港的医护人员举行罢工，抗议政府不肯关闭与中国大陆之间的边境以阻止病毒传播，这与早些时候抵制中国侵犯香港独立的行为如出一辙。这次罢工迫使政府关闭了三个边境检查站之外的所有边境口岸，

展示了基层工作者不合作的力量。5月底，成千上万的香港抗议者不顾居家令走上街头，抵制北京推动新的国家安全法案，因该法将进一步加强中共对香港的控制。争取气候正义的运动也调整了自己的框架，以反映人们日益担忧的问题，即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未来疫情流行可能导致气候变化上的不作为。在美国，仍在进行的反对种族主义和抗议警察暴力的活动，也与美国非裔死于冠状病毒的比例远高于白人有关——这只是持续存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之一。由于疫情已经影响了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这些信息现在可能比危机前更能引起广泛共鸣。因此，尽管最近全球范围内的非暴力抗议活动遭受了挫折，但2020年并不代表成功的非暴力抗争的终结。相反，疫情的大流行为世界各地的运动提供了一个急需的重启机会，并且许多运动已经明智地利用了这段时间。

（作者说明：感谢姜受延（Sooyeon Kang）和克里斯托夫·谢伊（Christopher Wiley Shay）为数据收集做出的贡献，感谢哥伦比亚大学、韦尔斯利学院和哈佛大学学术研讨会参与者提供的有益反馈。我还要感谢左伊·马克斯（Zoe Marks）对本文初稿的评论以及E.J. 格拉夫（E.J. Graff）提供的编辑协助。文中如有谬误均属于我个人）

注释.....

- 1 艾瑞卡·切诺维斯等：《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一波非暴力运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Erica Chenoweth et al., “This May Be the Largest Wave of Nonviolent Mass Movements in World History. What Comes Next?” *Washington Post*, Monkey Cage blog, 16 November 2019).
- 2 这一统计结合了《非暴力和暴力运动及结果数据项目》（*Nonviolent and Violent Campaigns and Outcomes Data Project*）（v.1.3）和《主要冲突事件数据集》（*Major Episodes of Contention Data Set*）的数据。在同一时期，还有成千上万的运动在追求其他目标，如妇女权利、劳工权利、同性恋和LGBTI权利、环境正义、经济正义、企业责任、和平以及各种政策变革。本文提供的统计数据主要集中在最大化运动上。这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些运动更感兴趣，而是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相对有

- 限的大规模运动子集，其数据广泛可得。
- 3 大约 40% 的非暴力运动也涉及暴力成份，我将在本文后面进行讨论。
 - 4 艾瑞卡·切诺维丝：《非暴力抗争为什么有增无减？》（Erica Chenoweth, “Why is Nonviolent Resistance on the Rise?” *Diplomatic Courier*, 28 June, 2016).
 - 5 同上。
 - 6 斯蒂芬·平克：《我们内心的善良天使：为什么暴力在减少》（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 Viking, 2011）。
 - 7 更多详情和其他一些假设，请参阅麦西吉·巴特科沃斯基编著的《恢复非暴力的历史：解放斗争中的公民抵抗》（Maciej Bartkowski, ed. *Recovering Nonviolent History: Civil Resistance in Liberation Struggle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2013）。
 - 8 赛琳娜加略-克鲁兹：《境外的非暴力：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地方非暴力动员》（Selina Gallo-Cruz, “Nonviolence Beyond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NGOs and Local Nonviole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34. November 2019: 655–74）。
 - 9 参阅自由之家的《2020 年世界自由报告》（Freedom House’s *Freedom in the World 2020 report*,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20/leaderless-struggle-democracy>）。
 - 10 乔纳森·C. 平克尼：《从异议到民主：公民抵抗转型的承诺与危险》（Jonathan C. Pinkney, *From Dissent to Democracy: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Civil Resistance Transi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马库斯·贝尔、菲里斯 S. 柏斯克及丹尼尔·蓝巴克：《非暴力抗争的民主红利》（Markus Bayer, Felix S. Bethke, and Daniel Lambach, “The Democratic Dividend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3. November 2016: 758–71）；艾瑞卡·切诺维丝及玛丽亚 J. 斯蒂芬：《为什么公民抵抗有效：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Erica Chenoweth and Maria J.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毛利西奥·里维拉·塞莱斯缇诺及克里斯蒂安·斯克莱德·格莱蒂兹：《是新鲜的康乃馨，还是没有玫瑰只有刺？非暴力运动与独裁政权的过渡》（Mauricio Rivera Celestino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Fresh Carnations or All Thorn, No Rose? Nonviolent Campaigns and Transitions in Autocraci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0. May 2013: 385–400）。
 - 11 对成功的这一定义存在争议，尽管就实际目的而言，它是用于比较不同案例的最可靠的定义。一些研究还关注长期的成功，如民主的扩张、权利和稳定。
 - 12 朱迪斯斯托达德：《主要的暴力和非暴力反对运动如何影响出生时的预期寿命？》（Judith Stoddard, “How Do Major, Violent and Nonviolent Opposition Campaigns, Impact Predicted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 Development* 2, no. 2, 2013）。
 - 13 布瑞安·马丁：《正义之火：反弹的机理》（Brian Martin, *Justice Ignited: The Dynamics of Backfir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7）；莱斯特 R. 阔特兹及李 A. 史密斯埃编著：《压制与非暴力运动的悖论》（Lester R. Kurtz and Lee A.

- Smithey, eds. , *The Paradox of Repression and Nonviolent Movements*.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14 切诺维斯及斯蒂芬：《为什么公民抵抗有效》第三章（Chenoweth and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Chapter 3）.
- 15 切诺维斯及斯蒂芬：《为什么公民抵抗有效》（Chenoweth and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 16 艾瑞卡·切诺维斯：《非暴力抗争及国家的应对的趋势：对民众运动采取的暴力是否愈演愈烈？》（Erica Chenoweth, “Trends in Nonviolent Resistance and State Response: Is Violence Toward Civilian-Based Movements on the Rise?”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9. January 2017: 86–100）.
- 17 艾瑞卡·切诺维斯：《特朗普政府采用的反革命工具包》（Erica Chenowe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doption of the Anti-Revolutionary Toolkit,”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51. January 2018: 19–20）；艾瑞卡·切诺维斯：《非暴力抗争及国家的应对趋势》（Erica Chenoweth, “Trends in Nonviolent Resistance and State Response: Is Violence Toward Civilian-Based Movements on the Rise?”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9. January 2017）.
- 18 凯瑟琳·辛金克：《希望的明证：使人权在 21 世纪发挥作用》（Kathryn Sikkink, *Evidence for Hope: Making Human Rights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19 丹尼尔·瑞特尔：《自由主义的铁笼：中东和北非的国际政治与非武装革命》（Daniel P. Ritter, *The Iron Cage of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Unarmed Revolu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20 切诺维斯及斯蒂芬：《为什么公民抵抗有效》（Chenoweth and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 21 泽伊内普·图费克奇：《推特与催泪瓦斯：网络抗议的力量与脆弱性》（Zeynep Tufekci, *Twitter and Tear Gas: The Power and Fragility of Networked Prote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22 切诺维斯等：《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Chenoweth et al., “This May Be the Largest Wave.”）
- 23 琳达·赫尔莱拉：《社交媒体时代的革命：埃及人民的起义与互联网》（Linda Herrera, *Revolution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The Egyptian Popular Insurrection and the Internet*. London: Verso, 2014）.
- 24 图费克奇：《推特与催泪瓦斯》（Tufekci, *Twitter and Tear Gas*）.
- 25 阿塞夫·巴亚特：《没有革命家的革命：理解阿拉伯之春》（Asef Bayat, *Revolution Without Revolutionaries: Making Sense of the Arab Spr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乔治·劳森：《对革命的解剖》（George Lawson, *Anatomies of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26 另见艾瑞卡·切诺维斯:《非暴力抗争的兴起》(Erica Chenoweth,“The Rise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PRIO Policy Brief* 19, 2016);切诺维斯:《非暴力抗争为什么有增无减?》(Chenoweth,“Why Is Nonviolent Resistance on the Rise?”)
- 27 奥马尔瓦索:《议程播种:1960年代黑人抗议活动如何影响精英、舆论和投票》(Omar Wasow,“Agenda Seeding: How 1960s Black Protests Moved Elites, Public Opinion, and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forthcoming));艾瑞卡·切诺维斯及库尔特斯科特:《同时期的武装挑战会否影响大规模非暴力运动的结果?》(Erica Chenoweth and Kurt Schock,“Do Contemporaneous Armed Challenges Affect the Outcomes of Mass Nonviolent Campaigns?”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0, December 2015: 427–51).
- 28 伊凡格斯特曼:《新冠疫情危机如何威胁全球的自由与民主》(Evan Gerstmann,“How the COVID-19 Crisis is Threaten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Across the Globe” *Forbes*, 12 April 2020, www.forbes.com/sites/evanger-stmann/2020/04/12/how-the-covid-19-crisis-is-threatening-freedom-and-democracy-across-the-globe/#6dec63234f16).